

[杨存昌、刘蓓]等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

时间: 2005-12-5 10:14:52

文章来源: 山东师大文艺学

浏览次数: 581

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

——“学术对话”系列活动第三期

杨存昌、刘蓓等

杨存昌：老师们，同学们，晚上好！我学科开展的学术对话受到了博士生、硕士生、其他专业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和关注，今天是第三期，主题为“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由我和刘蓓老师主持。刘老师对生态批评有较全面的研究，她将就生态批评的有关问题作主题发言，此后我谈一下关于生态美学的讨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对话。

刘蓓：我发言的题目是：生态批评的原则与策略。

什么是生态批评？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关乎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和原则策略的问题。1996年，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格罗特菲尔蒂（Glotfelty）如此定义这个被她及其同道寄予厚望的学术新生儿：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earth-centered）的方法研究文学”。尽管她还进一步说明了生态批评所关心的问题，但整体来说，她的定义给很多学者的感觉仍然是对批评方法的含糊其词和文化视野的漫无边际。不过应当注意，这个定义的出处，是生态批评的“就职演说”——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的引言，这个引言并非一篇纯学术性的论文，在宣告自身的“就位”、争取学界最广泛的关注这个意义上，它有其合理性。相比之下更为准确的，是哈佛学者比艾尔的定义：“在支持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下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个定义所界定的生态批评涵盖范围仍显过宽，但它很强的包容性恰恰符合他对生态批评的理解：这是一个“巨大而且正在继续扩大的学术领域”、一种“多种形式的考察”，这个考察“以环境问题为焦点”向多种视角扩展，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比教条化的政治解决办法更具表现力”。比照近年来的生态批评实践，可以看出比艾尔的定义是更具学理性的。多学科的涵盖和包容、多种事物的关联、对思想变革的提倡、对人与环境关系现实的关注、对伦理立场的坚持，正是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共有特征。

生态批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由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生态灾难已经迫在眉

睫，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文学批评实践承担着不是微不足道的、辅助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种认识下，20世纪90年代前期，生态批评倡导者主张，改变过去主宰过去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这种既定前提，决定了生态批评和后现代语境中那些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视角的文学研究一样，不仅以解读世界为目的，还试图跨越文本与现实的鸿沟，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这种带有“政治属性”的特征，在生态批评发展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当时的不少批评家有着强烈的反理论倾向，他们反对当代批评中的文本性理论，因其拒斥任何存在于再现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关联。他们主张，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就是强调文学研究应该设法使读者重新回到与自然的“接触”中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特别强调对“自然写作”的研究。所谓“自然写作”，原来特指美国文学史中一种非虚构文学体裁，主要描述人在自然环境中的身体和精神体验。这种文类以及浪漫主义诗歌等，由于作者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被认为具有生态意蕴，而成为初期生态批评主要的文本解读对象。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代表的一批自然写作用文本，被这些“文学史的重写者”们推崇为新的文学经典，代替了那些“以人类为中心的”经典文本的地位。

不可否认，考察自然写作是生态批评富有特色、也颇有建树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这个部分成了生态批评单一的研究范围，就会使它拘泥于某种文类的研究视野，限制它与更广阔文学领域的交流，更不用说与整个世界的交流，而这样的结果恰恰是背离生态批评宗旨的。国内对生态批评的某些介绍，过于强调自然写作研究的重要地位，容易使人对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产生误解，影响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实践上看，目前在美英进行的“生态批评”已经突破了“自然写作研究”的局限。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生态批评的行列中，为生态批评注入了许多新鲜元素。其中很多人借用生态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原来研究的文学作品和作家，使生态批评文本的范围大大拓宽，延伸至从《圣经》到儿童文学，从土著文学到左翼城市文学的广阔空间。同时，随着许多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被应用于生态批评研究，学者们进而思考：如何发展这种“生态为中心的”批评与其它人文的、理论的视野和其它类型的批评实践之间更具生成性的关系。目前的生态批评不仅可以用“任何方法”研究自然写作，还可以细察“任何文学文本”，甚至包括表面上看来完全是描写非自然世界的文本，解读其中的生态意蕴或人与自然关系。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话语原则上都足以成为“环境”的符号；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不是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之“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的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地质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环境性”在人类行为中曾经留下印记或者受到压抑。在生态批评家看来，所谓“环境的危机”，不仅指对自然环境的威胁，而且指整个文明世界的危机；这种危机也不仅关系到非经常性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更关乎更多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生态批评重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和现有文学理论的得失，试图再现在他们看来“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学和文化中的地位。从已发表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与以往的文学批评流派对“自然”主题的研究相比，生态批评进一步突破了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批评

者用历史的、联系的观点看待自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并且对自然采取一种伦理的态度——他们不是把自然世界仅仅当作一个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是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包含在他人中，也包含在自然中，人类对自然承担着责任和义务。不过，这种研究视角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生态批评的最终目标只是建成一套分析“文本中的自然”的新方法论。

生态批评是以“文学与环境”为中心的研究，围绕这个中心，它的研究形态又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二是涉及领域的跨学科性。欧美文学界对生态批评的否定和质疑，矛头也大多针对这两个方面。对此，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生态批评的这种研究形态有其合理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显示了生态批评的自身特质。生态批评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超越性的目标和广阔的理论视野所造成的。同时也要承认，反对者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也为今后的生态批评建设起到了警示的作用，相对独立的批评理论的建立，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可避免的任务。

生态批评的原则和目标，决定了它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又无法成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首先，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一种对“文化变革”的号召，来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一个“伦理学的扩展”、一个“人类观念的开拓”。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关于环境的观念和表达在以往的文化中一直存在而又常常隐藏不露，生态批评要对它们进行历史的挖掘。由于文本和观念具有连贯性，生态批评还要设法估价这种连贯性及其对解决环境危机的有益之处。进而，生态批评要揭示这些观念的狭隘与错误，因为过去文化对自然世界的臆断限制了我们的展望一个在生态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能力。通过这种发现，生态批评要建设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观——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看到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一旦拥有这种世界观，无论栖居在偏远的乡村还是繁华的城市，接近还是远离自然环境，人类都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与其他物种的密切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怀有一种在世界中的“在家园感”和对其他物种的亲情感。而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可以取代人类先前在交往中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从而建成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样和谐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既想知，也想行”的批评，为自己设定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超越性的目标，这决定了生态批评理论建设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但与其它文化批评类型相比，又超越了性别、种族、阶级、性趋向等单一的视角局限。生态批评广阔的理论视野，要求它与其他文学理论的整合以及多种学科知识的融会。生态批评把自然当作一个社会的、心理的建构，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剖析带有浓重的后现代批评色彩；生态批评对文学史进行“重写”，把文本历史化、也把对文本的批评历史化，借鉴的是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和“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生态批评在文本分析中经常采用新批评的细读方法；生态批评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策略，与解构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修正主义批评、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等当代批评一样，同属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宣战。不仅如此，生态批评还需要将文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从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中吸取阐释模型，形成了一种诸多崭新视野的融会，以丰富它的批评实践。

总之，目前生态批评的整体，还不能由单一的方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生态批评在寻找理论立足点方面遇到的困难，恰恰也在此。

生态批评的反对者认为，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更像一个关于“个人解放”和“社会动员”的政治问题；不应把学术性的文学研究与环境危机这样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总是与人类价值观和现实态度相关的。从古到今，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各种认识和想象，与文学的历史相伴而行，而人们如何认识和想象自然环境，又总是与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境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看，生态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提出，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时的又一种“关于环境的想象”。只是这种新的想象，是在20世纪蓬勃发展的生态哲学和后现代科学的理论土壤中发出的新枝，它深刻地反思“现代”人类精神文化，并力图重建一种更加健康的当代人类精神文化，其价值和意义是无法否认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环境主义精神和文学批评理论实践之间取得平衡，是生态批评在未来发展中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一样，也要进行一种“身份批评”（identity criticism）——女性主义批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的性别身份是否影响了我解释文学中的性别再现；生态批评要解决的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的“环境身份”是什么，这为什么与我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谈论环境问题、谈论环境问题与人类利益的联系相关。再如，在女性主义、种族修正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等的讨论中，反叛的主体都是具体的——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者，它们就行走在完全掌握特权的主体之中。“种族主义”、“女性憎恶”、“同性恋憎恶”这样已经固定的术语，分别对应着一些得到承认的主体——遭受歧视的种族、被憎恶的妇女、非原始的性趋向等，它们能够为文学批评中的讨论建立框架。那些批评中有一系列术语来描述社会对思想进行压迫的制度、描述在这些压迫下恐惧和忧虑的社会对象，但是当这个被压迫的对象是非人类世界的时候，又将如何进行理论上的界定？... 如此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维护生态批评的独立性、保持生态批评的生命力，将大有裨益。

理论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生态批评家的重视。最新的生态批评成果表明，生态批评研究的重心，正在从表明自己挑战性的立场、“发出革命性的声音”，向批评的理论化上转移。批评家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文学-环境文本语境，更加注意阅读实践，重新关注文本性本身。显然，“绿色化”的文学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对认识和改善人类与环境关系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根据地。

这种良性发展的态势，不仅增强了我们对生态批评未来的信心，而且也启发文学研究者认真思考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生态批评，或者说生态意识与文学研究的整合，究竟对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生态批评的兴起，是否将文学学者的人文思考向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又推进一步？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的主流已从文学的内部研究重新转向外部研究。人类意识、行为、精神、价值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一个机械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加以剖析，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新的层面上被纳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生态批评也归属于文学研究的这种大趋势。认识和研究这个新兴文学潮流产生的语境，对于此项研究的继续深入，很有必要。生态批评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浮出水面。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使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发

现了更多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对同样的问题，因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又因国情、文化背景、学术基础的不同，又会“同中存异”。我们深知，西方的文明进程、文化背景和环境问题与中国尚有不少差别，然而我们既无法否认生态问题在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这个意义上的重要性，也看到文学研究对生态问题的介入是人文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国外生态批评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们参与并建设中国“绿色文学研究”的信心。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用生态批评的原则和策略去解读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古今文学史，又是一项极具开创性、挑战性和诱惑性的工程。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认识到他们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助于我们明确今后的目标和途径。进一步关注国外生态批评的发展，将使我们继续获得有益的启示。

杨存昌：我简单说说生态美学的问题。其实我对于生态美学也不很了解，只不过就目前的学术现状谈谈我个人的感想。

与借鉴生态批评不同，借鉴西方生态学思想并运用于中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举，这种互相借鉴的交叉研究，不仅有利于美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美学与显示进程的融合，是值得大力肯定的。但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又要有学科意识。非常明显的是，西方的许多学科是在其发展起来以后加以命名的，但是我们中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急于创立学科或为学科命名，这一点我持保留意见。应该说呢，目前关于生态美学的讨论，是力图在美学研究中引进一种新观念、新意识、新视野、新角度的做法，它可以改良或者改善我们的美学学术生态。因为有时候一个传统学科在其自然的发展中会出现自我封闭、自我凝固的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学研究引入生态学的纬度，必然会对它的发展有所建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等于提出一个新视角就意味着一个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生态美学，像刚才刘蓓老师介绍的生态学、生态文学、到生态批评这样一种学术谱系。所以我提醒大家关注这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在美学学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应肯定引进生态学纬度的做法。但是我们以某种理论视角作为审视纬度的时候，是建立在经度被确立的前提下的。生态美学的经度应该是什么？在这个经度确立的前提下，建立和增加一个个的纬度，才能促进这个学科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发展。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意识到在不同的学者引入生态学这个纬度的过程中，他们不是站在美学同一条经线上引入的。有的人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有人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有人就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如果我们这条经线不是美学的话，那引入生态学纬度所建立起的学科还能叫做“生态美学”嘛？

大家注意到我出的思考题是生态美学能否成立。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我以为至少建立在这样几个条件下：首先是它是否具备构成一个学科的逻辑起点。

“生态美学的建立”是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在什么样的理论语境中，在美学发展的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提出的？对生态美学的建设，是建立在原来的那套美学话语系统中的某一个分支上面，还是它的逻辑起点直接与原来的美学话语系统相抗衡，这是一个分支学科能不能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标尺。如果我们把生态美学理解成一种方法，或者理解成一种意识，或者理解成一种文学追求倾向，那这个时候只不过是在某些领域里面，如生态的视角，生态的观念，把生态学和这些领域结合起来。它实际上已经把生态文学转化成文学生态，把生态美学转换成美学的生态性、生态意识或生态智慧。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美

学是不是原来就有生态性，如果原先就有美学的生态性，提出建立生态美学，即在美学的经线上，在考虑美学问题的时候加上生态学的维度、视角，就等于将美学“经度”上原有的东西改称了“纬度”而已。

其次，在有了一个逻辑起点，有了一个生态美学是建立在某个学科，建立在某种理论状态之上的前提下，生态美学能不能提出一套在美学中有特色的概念范畴，这应该生态美学学科能否成立的另一很重要的问题。有人说目前生态美学非常繁荣，以至于谈美学不谈生态美学就像是一个门外汉。因为中华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开了会，讨论生态美学问题，而且这些会议都收到了挺多的论文，还有几部专著已出版。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生态美学的独有范畴，或者说在原有美学范畴的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亚范畴及其谱系还不是很明确。生态批评是有它的范畴序列的，也有它的运作方式，有它关注的问题。但是生态美学，大家提一提你们见到的关于它的范畴有那些？大体有几类，一类是把生态学范畴放到美学里面，另一类还是原来美学的范畴，还有第三类，就是其他美学分支或流派的，比如说现象学的美学范畴、存在主义美学的范畴，也算作生态美学范畴。我们这样一种愿望和动机是好的，但生态美学这个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还不像生态文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批评那样，建立起它的范畴序列来。那这个时候，生态美学建设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建设出来的是不是生态美学还是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呼吁盖教学楼，这盖楼的每一块砖头，都号称为盖教学楼，最后建设起来大家发现是一座宿舍楼，就说明教学楼没盖起来。建设生态美学在学理上有它应走的道路。如果没在它的道路上行进，不客气的说有时候越走的起劲，离目标就越远。急于命名做法，让中国当代美学从九十年代以后花样不断翻新。大家可以数一数，大概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学，如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有一类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商品美学、企业美学，等等。我们当初学文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发现过，文学题材实际上用几种方式进行划分：一种是用文学所描绘的领域来划分，比如说工业文学、军事文学、农业文学，它首先是生活的领域，其实是文学的主题领域，这是可以分出各种各样的文学来的，比如说抗美援朝文学，这也不能说它不成立；另一种是从创作精神、创作追求、创作原则来划分，对于文学的文本来说，它的创作建立在作家对世界的某种认识上，建立在作家本人的某种追求上。还有，用互相交叉的方式去划分，类别就更多一些。比如说爱情文学，也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关注，但好像和创作原则没有关系，因为爱情文学，我们发现它出现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里面，可以是现实主义文学，可以是浪漫主义文学，也可以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那对美学来说，这种学科的划分的交叉就更多一些，所以生命美学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可建设性的，生活美学出现的时候，也是有它的可建设性的，那么说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应该是美学的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好像科技也有美的问题，商品也有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这种学科建设它所针对的语境是什么，其价值何在？生态文学好像目前针对的语境是沿着环境主义而来，表现文学中的环境主义。但文学中的环境主义，和文学批评中的环境主义，可能有一个区别。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环境意识，这可以作为文学中环境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环境批评可能就会不同，环境批评家不是以文学作为对象来考虑问题，而是以部分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环境主义的批评家不一定就是文学的批评家，

因为我们如果从环境的视角去考虑文学问题，应该是以整个文学为对象。那么研究一部分文学作品，还不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认识。作为学术是可以的，作为学科就立不起来。对环境美学这个学科来说问题就更多一些，但它是适应着环境主义的倾向，环境主义的意识这样一条线索而来的。站在它旁边的两个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是两种对立的观念：第一个是科技理性主义，人们把环境和生态主义的理论引入到美学研究里来，是力图延续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不是十分明显，实际上在席勒的时代已经提出来了，已经提出了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席勒的美育应该是包含了生态学的智慧的，但是席勒不叫它生态学美育。像刚才说的，美学已经包含了生态主义这样一种意思，从席勒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许多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在延续这样一种理念，就是找寻一种和科技主义，和理性至上，和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片面性相对立的美学立场，美学方法，这种倾向不应该把它仅仅圈定为环境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提出了这个问题，现象学美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分支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说，生态美学要以生态学观点与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潮流相抗衡，就有点拉大旗作虎皮，就像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生态主义者，现在我们却说海式美学是生态美学，有点无限上纲。第二，生态美学所反对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大概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对立面的基础上，由于人们对工业社会的批评批判，实际上对工业社会的批评批判大体我们后来已经把它当作美学的问题了。你会发现，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理性、科技，工具理性的批判，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当作美学的内容，尽管它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意识形态理论也好，文化学理论也好，艺术学理论也好，把这些意识、把这些文化观、把这些艺术观念，统统的已经当作美学来看待，这样就实际上延续了传统的一些认识。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大概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可以说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还是反人类中心主义者，他都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发言。因为不管你怎么批判，我们都得承认能够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创造，使人区别于其他的存在物。而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发展出科技主义和人文主义，统统依靠这个理性，如果没有这个理性，我们就不能进行任何批判，美学不存在，生态学也没法存在。而很可能，它是在另一个方面，一个更小的视角上来考虑问题，那就是相对于生态主义，任何外物之间的和平相处，人与自然和谐，人不仅仅把自然当成认识的对象、改造的对象、加工的对象，同时人也把自己放入一个自然的生物链当中去，我们所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些内容。那这样，建设生态美学就应该有一个大体的轮廓。如果没有这个轮廓，建立起生态美学这个学科的前景就不怎么乐观。那么现在看呢，许多要建立生态美学的学者已经在发表的文章中说，生态美学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学科。为什么要这样考虑问题呢？因为经过努力，它不得不回到美学的起点上去，这就会遇到很多当初我们要建立生态美学时要考虑的语境问题。

一个问题是：生态美学的建设者把人类文明分成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原始文明阶段，另一个阶段是农业文明，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第四个阶段叫生态文明。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只有生态文明的命名和前边的不一致，前面说的是现实的文明状态，后面说的是在现实的状态中文明的追求，说的不是一回事。原始文明是依据原始状态而命名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是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边以农业为主而构筑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所以由此

产生的文明叫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又是在工业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文明状态。而生态文明呢，恰恰是在生态破坏最严重的社会里产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从原来生态意义上的文明来说，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生态文明不断破坏的状态。如果有一个生态文明的话，原始时代的文明叫原始生态文明，比它次一级的是农业文明，更次的是工业文明。所以当我们在报纸上发现人类正在由超越工业文明而进入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和以前几个阶段文明的定义，完全是两回事。他有点像庄子所说的，当某种价值失去的时候，人们才呼唤这种价值。他说“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我们的文明经由工业社会到今天出现了更大的破坏，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发现了一种叫沙尘暴的现象，于是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环境保护成为不能不提倡的运动或追求，根据这样的一个运动和追求，我们命名了这个时代。就是说，生态文明的时代，在生态美学建设者那儿，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运动和追求，才把这个时代叫做生态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是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时代，是追求生态文明的时代。那如果这样考虑问题的话，农业文明越是发达，它的那种凝固性、封闭性、低效率化就越强烈，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工业文明，需要机械文明。如果按照我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来命名生态文明时代的话，那农业社会的文明应该叫“非农业文明时代”，它是建立在一种错位的基础上的。也许这样一种对命名的方式导致了生态美学的命名：我们觉得美学在农业时代有个理想，工业社会有一个理想，在生态文明时代也有一个理想，那么生态文明的语境在扩充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意味着论证了它的特点。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生态美学和其他美学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一种说法认为生态美学和原来的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原来的美学强调的是实体性，而生态美学强调的是美学的关系性，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把更合理的性质的美学理论当成生态美学，内容却仍然是强调对原来的学术认识。这里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是旧问题，即原来的美学是不是存在着审美关系说，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美学在鲍姆嘉登时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理性认识论是人的理性关系的认识论，感性的认识论是人与对象的感性认识关系，谁说原来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呢，美学原来就有关系性。那我们说只有生态美学把美学转向了审美关系，这样概括是有问题的，因为审美关系说早出现了。我们把原来美学中已有的观念当成生态美学的对立面，而把原来美学已经包含的东西又说成生态美学所独有。再进一步讲，生态美学在关于美学的关系性问题上有没有更多的或者是深入思考，我看还不充分。因为我们早知道美学研究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然就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和其他人的关系。那在生态美学出现以前不是已经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吗？。第二种说法呢，原来的美学研究的是美的主体性，审美的主体性，生态美学则研究主体间性，这有一个先在的缺陷，这个主体间性说的是人与自然的主体间的关系。为什么说它具有先在的缺陷，因为按照生态学所力图提倡的观点，主体性本身应该是不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才会有主体，我们把人类当作主体，把对象当作客体，而生态美学阶段主体性非但没有减弱，相反的人类的主体性又被凸现出来了。这一点还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寻找主体间性，我们把客体也当成主体，尽管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平等作为一种观念是正确的，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平等，是超越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刚

才刘老师提到了浪漫主义时代的生态文学的一种追求倾向，实际上浪漫主义时代对自然的理解，首先是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的主体性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首先由西方凸显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凸显，才导致了人对返归自然，复归自然这样的追求，才出现了浪漫主义的诗歌运动。而生态美学要建立的逻辑起点却是取消主体性，我们把原来的主体性和现在的取消主体性融会到一块，创造了主体间性。第三种说法是，原来的美学是认识论的美学，现在的生态美学是存在论美学。存在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的确是西方美学发展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存在论美学在生态美学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而且出现了相当多的成果，虽然生态美学所关注的也是人的生存问题。但它和存在论美学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而且，恰恰是生态主义的观点和观念要求我们的美学不仅仅在一个层次上来研究，存在只是一个终极的问题。所以实践论的美学，认识论的美学，体验论的美学，符号论的美学，都应该在同一个美学生态序列中得到发展。单纯的说生态美学要走存在主义的道路，又和原来的环境主义美学完全是两回事了。你们发现了吗，这样的生态美学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人的精神生态上，它和环境生态没有什么关系了，它是在讨论到底是存在的现象是重要的还是存在的本质是重要的，而这个问题又要绕过认识论去找，那么你要么落入彼岸，要么落入苦海，它不会咣当一下出现。还有好多好多的说法。比如说，原来的美学建立在认识论的“去蔽”这样一条路线上，现在的生态美学要“复蔽”，关于这个问题我看的资料不多，翻了翻关于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和它的理论特征的描述，在学理上还不是很扎实，但在这点上决不影响我们去研究它。好象研究者还有一种倾向，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中可以作为生态美学支撑的理论，与东方古代的智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甚至说，海德格尔关于生态的许多方面的问题，是道家的问题，海德格尔与老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实际关系，是一个哲学界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但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老子的思想，理由不充分。但从总的倾向看，这实际已经不把生态文明当作新时代的文明。如果生态美学的观念来自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来自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这样一个逻辑自然就论证成凡是美学思想都有生态性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生态美学建设的呼声，对于美学也好，对于我们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也好，对于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好，它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生态美学的建设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到底具备不具备学科的可建设性，另一个问题是它能不能建设成为一个特殊的美学学科。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在建设的道路上就会走弯路。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关于生态美学的争论，而是看能不能从更学理的意义，搭出一个生态美学的框架和轮廓，然后再去做具体的工作——资料的工作、理论的工作、范畴的工作、系统的工作，而且使它形成一个的确区别于美学的思想体系，避免互相纠缠。。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觉得研究生应该积极关注美学学科的建设，即使一些尝试“出师未捷身先死”，也一定能为美学探索做出贡献或提供鉴戒。另外，要引入美学研究新纬度的话，除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名称之外，我们更需要开拓的是美学发展的方向，在理论美学一步一步走向学理化、精致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学理论这样一种框架体系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不予以关注、对人的日常生活不予以关注的美学家的美学或“纯美学”，所以美学要走出象牙塔，走出书斋，走向生存体验，走向生活体验，在生活体验中探讨生存的价值，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本质，这样美学才会越研究越有意义。离生活越来越

远的美学，不是我们要建设的美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美学有它的道理，生态美学有它的道理，日常生活审美化有它的道理，科技与美的关系也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不能把美学和日常生活等同起来，让美学的日常生活化变成美学的庸俗化，或者让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变成日常生活就是美这样一个判断，同理，生态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美的。

总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学科命名的问题，而是人类的知识形态的走向和需要问题，是价值问题。因为我对生态美学没有什么系统的研究，只能从美学方面去打生态美学的擦边球，讲讲我的一点理解和看法，一定有很多谬论。我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欢迎大家提出激烈的批评。

辛明（200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我觉得生态美学是一个纯粹西方理论性的东西，对我们国家是一个渐入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也有关于生态的文章和思想，能不能把这些生态的思想运用到中国文学理论上去，比如说陶渊明还有很多人的关于“桃花源”的理想。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问题，虽然有个生态文学生态批评之类的问题，又很有搞头，但是这里还有个政治霸权的问题，比如我所了解的美国的一个现象，有很多人想搞生态文学，还有现在正在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就拒绝签，这是根据经济的实力来制约绿色的环保的东西，我是说文学文化和政治权力这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处理。这就是我提出的两个问题。

刘蓓：你提出的问题也是我这几年研究生态批评时一直提醒自己注意也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把生态思想运用到中国文学理论上去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要借鉴生态批评理论实践时一定要注意其西方特色，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应该认识到，生态批评既是美英绿色文学和批评传统的延续，也具有特定的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它是在席卷西方社会界和学术界的激进环境主义思潮中诞生的，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潮流的一部分。我们的借鉴中需要注意甄别。具体点说，西方生态批评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有很多不同的。西方的生态理论有着显著的后现代理论色彩。中国儒释道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观念生成于封建农业经济时代，两者产生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哲学基础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的绿色文学研究不能把当代西方的生态理论直接拿来，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一锅烩。再如，现在的生态批评具有跨学科研究特色，跨学科性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学术研究界的一个共同倾向。还有，生态批评研究中也显示出“文化研究”的倾向，不局限于纯文学文本，这也是当前西方文学界的一个趋势，对此国内文学研究界还是有争论的。

生态主义话语实际上是很强政治属性的一种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政治话语，而且在西方有一些政府执政期间，生态主义实际上是作为他们的政策方向的，我们知道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就是一个环境主义者。在欧洲，像德国法国，他们环境主义者在政府占了很重要的位子，像德国的外交部长菲舍尔，就是绿党的首领，绿党和施罗德的SPD联合起来在上届竞选中获胜，他们的联盟就叫红绿联盟。

杨存昌：山东大学的郁庆志，他是从1995年开始研究绿党的问题，另外你提到戈尔，他虽然是一个环境主义者，曾繁仁老师也是研究生态美学的，他曾反复地批判戈尔的一些观点。

辛明：另外我觉得这只是在国家内是这样的，但这只是由生态来谈生态美学问题，像非洲有些国家连吃饭都吃不上，怎么来谈生态问题，还有就是国

际之间，像美国一些工厂转移到亚洲非洲来，它可能在国内宣扬生态问题，在国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刘蓓：对，你说的现象用一个绿色研究的术语来说，可以叫生态帝国主义或生态沙龙主义，这涉及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为环境争取“正义”的同时，怎么样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环境正义”的问题。西方的环境主义者其实也是在争夺一种话语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激进环境主义是“超越左与右”的，但实际的操作中有很多问题。“可持续发展”，作为口号和努力方向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这永远只是一种理想，激进环境主义者所追求的“超越”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恐怕是社会政治实践中永远无法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通过文学的审美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理想，恰恰是更具有可行性的。另外关于西方环境主义者提出的文化改革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对自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进行重新审视，中国现在出现的生态问题确实十分严重，而要解决这些生态问题，确实要从改变观念入手，而不是仅依靠技术手段。通过绿色文学建设来为文化改革作贡献，是生态批评家的初衷。

杨存昌：现在大家愿不愿意还是一个问题，比方说，你愿不愿意放弃工业文明给你带来的生活便利去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比方说树叶子当衣服是很麻烦的，你得用三个小时才能把它穿好了。

刘蓓：关于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在我看来，在美英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一些在开始阶段把“反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批评家，现在已经不再就文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问题进行纠缠了，一是因为这个笔墨官司再打下去可能永远都是没有结果的；二是因为这种争论可能会偏离文学研究的核心。一些生态批评家在生态批评发起阶段持有的那种富有侵略性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论调已经大大缓和，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对那些“对人类有意义的内容”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是更加具体地结合文学文本进行的。我认为这也应当是我们的绿色文学研究的方向。

杨存昌：刚才刘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西方生态主义批评它的来龙去脉和它的理论追求，大家现在先别管它学科问题，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去发掘一下它所体现出的思想，这样讨论会更有意义一些，文学中所体现出的生态学思想，中国古代人的生态智慧，美学更关注的是精神生态，建设精神生态和环境主义基本上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生态学对人与世界的亲和关系这层意义拿到美学是对关系的一种调试这样一种角度，怎么样去调试，人何以和自然和社会和他人处在一个更亲和的关系里面，你不要管它叫伦理学也好叫哲学也好美学也好还是叫文学也好，能够发掘这方面的智慧，它是对我们可持续发展，在解决人类向文明的不断进程中遇到的一些负面效应会有一些好处，我们美学的论文可以侧重这方面去选择一些题目去做一下，比方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诗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来处理人和山水的关系。今天我看了一个题目，关于时间的审美性、时间的审美化问题，实际上呢，时间的审美化也好，空间的审美化也好，甚至审美的表达机制也好，审美的心理机制也好，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你都可做具体的研究。

辛明：生态学是西方的东西，特别是工业化以后产生的东西，所以要把它生搬硬套到中国古代思想中去，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你比如说陶渊明的一些思想，表面上看它是自然美学，比如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思想，其实从背后看，他是做不上官，很失落的一种自我安慰。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不是工业化的结果，所以如果把生态学硬套到中国古代思想上去，那么它（西方生态美学）跟我们谈的生态问题没什么关系，而且可能出现一种偏差。

杨存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儒家思想也好，道家的身与物化也好，佛家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佛性也好，这样一些理论，听起来和生态学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尺度，那就是现代生态学，或者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传统思想消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它形态上的相似性是一个方面，但是学理上的不同性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的，如果现代生态学竟然是对古代思想的一种还原的话，那它体现的就不是思想承继的不断提升了，就成了我们越不思考越有思想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也正是我对刚才那个逻辑的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的逻辑从建设这门学科开始，到发掘西方二十世纪哲学思想作为过程，最后落脚于对东方古代智慧的回归上，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比方说原始时代人与世界的亲和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上，而我们今天的生态学是在生态文明被破坏的前提下才开始出现这种学问的，这里所阐发出来的思想和还没有产生这种意识的时候的思想，这之间无论如何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我们通常有这样两种心态走同一条路，就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和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这两种心态走了同一条路，认为西方出现一种理论就好的人，说到最后说这种理论体现了东方思想，这是一种情况。另一部分人说根本就不好，因为我们古已有之，这两种心态都忽略了学术的演变环节，学术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你清理出了它的学术的演变环节，你才是进入学术状态，如果仅仅是直感，我们中国的道家就是现代的西方思想，这肯定有问题。如果反过来说，西方现代思想来源于我们中国的道家，这两种思想实际上最后殊途而同归。都是消除了学术演变这样一种过程，因为对异化的遏制这样一种学术理念，必将建立在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而提出的理念很可能和异化现象没出现的时候人们所秉承的理念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没有学理的，一个是学理演进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不是一个东西。

刘蓓：辛明刚才提到陶渊明的作品如何来解读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陶渊明的作品的“生态解读”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我所反对的，就是那种从陶渊明的作品解读出当代西方激进环境主义思想的内涵，这种解读是很牵强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生态批评解读的方法来解读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的。举个例子说，精神分析理论恐怕是大多数作家没有自发的或自觉地运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论方法去分析任何一个作家的心理或作品。用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作品也是这样。我觉得对陶渊明的作品作这样一种“生态解读”是可以的。

杨存昌：大家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问题，学术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每一个思考者提供了交流碰撞的机会。

秦同国（200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我想说一下，谈起生态哲学和中国古代的环境还脱离不了“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但是刘晓波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说到底还是自然的定位，但是我们想一下，当时出现“天人合一”思想时，生产力是非常低的，那人们问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天与人是合一的，我们想象天与人是合一的，那么自然就对我们是仁慈，只能给我们恩赐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所以说说到底还是一种早期的人对自然是服从的关系，只

有在科技文明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种错觉就是认为天与人一直都是合一的，就像文化研究网站上写的文章，骨子里还是那四个字“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好像脱离不了这个老调子。所以说，用中国的话来清理古代的自然是有困难，但是当我们真正借鉴西方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话语就是欧洲中心，和中国相距太远，如果用西方话语的话，我们又会担心会患失语症，我们总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上，我们怎么既能运用这种方法又不会失去中国的特色呢，这看起来是很困难的。

杨存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不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平时写文章也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一方面我们用一种理论来解释另一种资料，这是一种很好的开辟学术思路的方式，比如说中国从来没有接受美学，但是接受美学的一系列的观念新批评的观念拿过来到很管用，比如说它有一个填空理论，而恰恰这种空白正是我们中国文学艺术最强调的内容，那样作为接受美学的填空就可能启发了我们一种思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我们必须考虑学术的兼容性问题，有时候我们用不兼容的东西去联结它，但这种联结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张世英先生，他很明显地受中国古代哲学中未分化的天人合一去批判主客二分，你从他的二三本书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有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他实际上觉得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比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要高明，这就开始出现学术上的不兼容了，就是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出现在两个逻辑环节上，一个是未分化状态，另一个是有感于主客二分的高度对立性才出现，但平常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学术论文里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把本不兼容的东西兼容起来，最典型的就是茅盾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套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你能发现他最后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头头是道，但基本上没有得到证明，因为这套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那里实际上是不兼容的研究方法，所以他拿过来的时候研究的确出现了新话语，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也许李白和杜甫永远不能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去贴，有了这个工具后你比原来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多出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学理上能不能站的住是个问题，所以今天你看茅盾的有些理论时有些东西很荒唐，因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两条路线上，而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西方理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本不相一致，而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再加上一个阶级对立，就是工业社会里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他用这样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去研究农民和封建主的对立，那自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借鉴我们所获得的科学的解剖刀去解剖原来的事物，另一方面呢，有一些解剖刀看起来很好，但是却容易带来一些麻烦，并且不能一用再用。比方说海德格尔分析凡高画的那一双农鞋，他再怎样分析凡高的“向日葵”。很可能他不分析农鞋而只去分析向日葵也能分析出一个什么天地神人四方神圣来，那他要分析他的“自画像”呢？事实上海德格尔把艺术批评哲学化了你可以分析器具的器具性，农鞋有农鞋性，向日葵有向日葵性，自画像有人物原型性，但文艺批评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我们现在会发现许多文章，许多著作说到天人合一就无话可说了，那还能说什么？到顶了，实际上呢，古代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相比，至少有一半在学理上没有形成一种学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了主客二分之前的那个天人合一观念去作为主客二分之后的那个天人合一去看待它，那海德格尔思想里面所谓的道说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为什么海德格尔那

么喜欢沉默，那么喜欢在一种惊讶状态里面沉默？因为主客二分是能说出来的，而天人合一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两个极端就是不一样的。

刘蓓：在西方没有“生态美学”但是有“环境美学”研究，环境美学主要有着两个相互交叉却有所区别的主题：一个研究环境主义意义上关于自然的审美，一个研究作为欣赏对象的各种环境的概念，这些环境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为的。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的不同，突出地表现在站在环境主义立场上研究自然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符合环境伦理的环境是一种美的环境，自然不应被看作待征服的对手或者供剥削的资源，而是有着自律性和存在价值的事物，因此“荒野”不再被看作是丑陋或者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地方。环境美学家重视的，不是自然中直观的、属于优美景致的方面，而更多的是自然中由进化理论和生态学揭示出来的概念性方面——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整体性、物种稀有性、物种的相互影响、本土性等等。一个沼泽从形式上看是滋生了很多蚊子蝇虫的肮脏地方，但当我们把这个沼泽看作沙丘鹤的栖身之地，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鹤源自遥远的地质年代，当我们认识到沼泽中所有的有机体具有内在关联的时候，沼泽就变成“一个具有稀有之美的事物”。相反，外表美丽却并非源自本土的植物和动物，可以被看作是环境美的损害者，因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的平衡。

杨存昌：几年前的国际美学会议曾把环境美学作为中心课题，但我翻了翻那次会议提交的文章，他们对环境美学的研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说有人长篇大论论证垃圾烧成灰再做成砖盖在楼房上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几乎不是一篇美学文章，但是这样的文章在国际环境美学大会上受到了高度的推崇，还有一些就是实验的东西包括空气质量一系列的东西都进入了环境美学的研究范围里去，深圳的彭立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有他写的文章我们看起来像美学的文章，所以中国美学研究者和西方现代研究美学的人关注的问题好像不是一回事。目前在外国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美学问题很少有人讨论，这至少给我们提个醒，我们不能空谈。

徐淳理（0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杨老师，我想写园居生存和人文理想人文建构的关系，您和刘老师能不能在生态美学或生态批评方面给我指点一下。

刘蓓：文艺学网站上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一个研究园林的女老师，她是研究苏州园林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环境文学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环境启示录文学，启示录就是把灾难的东西强调出来，也有人叫它环境警示文学，它其实和科幻小说有所交叉。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西方的很多科幻电影写了未来的完全是机器的灰暗的很可怕的恐怖的人类的世界，在这方面给人类一种环境的启示。我看到一本国际生态批评的选题里面选了一篇中国的文章，在上海读书的一个人，他写的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问题。其实现在整个的生态批评主要的阵地是在美国遍及英国，其它的包括非洲澳大利亚欧洲大陆它们主要的还是在英国美国之下对文学的研究。

于永森（200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刘老师，生态批评与文学艺术在哪方面有联系？

刘蓓：生态批评就是生态文学批评，而不是把“生态”作为研究对象的批评，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者进行的研究。

于永森：刘老师，它的价值取向是不是就是一种美，（李大伟：即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的价值取向是不是美。

李大伟（2003级文艺学硕士生）：那就得看你对这个美是怎么界定的吧。

于永森：刘老师您对生态批评的前发展可能带着一些困惑，我觉得生态批评从本身上说最根本的就是缺乏一种明确的理论上的支撑。比如说什么是美？这个问题很难说，但是具体到生态美，我们心中会有大体的一个明确的概念，都大体知道什么是生态美。生态批评它开拓的潜力很有限，这可能是先天上的原因。

刘蓓：我说多，现在的生态批评和其他一些后现代批评相似，它不是受方法论的驱动而是受问题的驱动。这种批评——你认为它是文化批评也好，把它作为文化研究也好——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认为既然它已经存在了——象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已经存在了那样，我觉得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去研究乃至借鉴。至于它应不应该存在，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想，如果它没有脱离文学研究的轨道，它还是可以发展下去的。关于它的发展前景如何，那就看我们怎么进行发展。

于永森：我觉得它总体上缺少理论上的东西，理论上的指导，它没有提供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形态，这恐怕是他的根本缺陷所在。

刘蓓：你说的也不错，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生态批评家本身有专职和兼职两种生态批评家，专职生态批评家主要是一直从事“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研究的学者和专门研究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家，他们现在正努力走出一个怪圈：翻来覆去就是在为研究对象唱赞歌，摒弃理论。我觉得有些研究者对作品中“场所意识”的关注，这倒可以作为未来生态批评的一个发展方向。另外就是兼职的生态批评家，因为他们的存在，所以现在对生态批评是不是一种“批评”，也是有争议的，有的人就主张我们不要叫它生态批评，而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学研究的绿色潮流，因为一说“批评”就应该有一套方法。

杨存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刚才刘老师说，生态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像女性主义批评，我也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女权主义的批评成果是用来建设女性学的还是用来建设文学批评理论的，生态批评的成果适宜建设生态学还是适宜建设文艺学和美学。因为我们有个功利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大意义上是希望发现女性主义批评中可以深化对文学认识的东西，希望从生态批评中去寻找那些可以用来深化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艺学所使用的材料，作为意义来说，这两方面都是有意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如果对女性运动和女性学能够产生推动的话，这自身是一种价值，但是它是一种社会价值。如果能够推动人对文学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价值。从我们文艺学科来说，我们需要鉴别这两种价值。也建议刘蓓老师你的博士论文要强化它在文学批评文艺学建设内容方面的东西。（刘蓓老师：就是说应该怎么进行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哪怕是寻找出几条它自己对文学认识特有的理念，这就是你的论文最大的贡献，因为做一篇文学论文而不是作为研究历史的论文。你得把它的批评实践里面它的论著里面体现出的新的理念新的内容的东西在总结总结。

刘蓓：国内研究批评也有几年，但好像还没有走出号召宣传的这种模式。现在不少研究生态批评的论文中存在着一个问题：总是在谈我们应该搞生态批评这个问题，而且把为什么要搞生态批评，总是强调环境危机何等严重，而不是仅扣文学理论。我觉得研究生态批评生成的理论语境，是研究西方生态批评

的第一步，应当把这个语境展示出来。搞生态批评的人不应只是强调生态主义的正确。就像有的人说生态学是终极科学一样，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任何一个科学都不是终极科学。说生态学是最好的科学可能还太早，其实目前生态学还在发展，还不成熟。你把它当作终极正确的东西，就会影响研究的学术性、客观性，我觉得这不妥。

杨存昌教授：星期天书摊上有一套书《昆虫记》非常好，科学的价值理论的价值和语言学的价值都很大。

刘蓓：它也属于“自然写作”，这种科学文本也是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有的人甚至把美国的环境法案作为研究对象，还有研究电视节目的，这体现了文化研究的方向。

杨存昌：今天的学术对话未尽的地方可采取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大家根据今天刘老师介绍的生态学生态文艺生态批评有关方面的问题，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写下来发到文艺学网站论坛上继续交流，另一个方式在刘老师课上进一步向刘老师请教或提出问题。今天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鼓掌结束）

（以上由于永森、秦同国、李莎莎等记录整理）

----- 相 关 新 闻 -----

- [学科建设]关于做好二〇〇八年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2008-3-4)
- [学科建设]关于做好二〇〇八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和授予工作的通知(2008-3-4)
- [学科建设]我学科两课题获2007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立项(2008-2-28)
- [学科建设]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008-2-20)
- [学科建设]周均平教授被评为2007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8-1-7)

[【打印本页】](#) [【文章检索】](#)

相关评论: ★遵纪守法，请您文明用语

该文章目前没有评论

*您的网名:

您的邮箱:

*评论内容:



联系我们: sdnuwx@sina.com 鲁ICP备040294号

欢迎您来到山东师大文艺学网!

山东师大文艺学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